

中国制造面临高低两端双重挑战

张莱楠

美国产业资本回流正在拉开大幕,据最近的一次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这一趋势对中国制造而言,都将构成挑战。

商务部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份以来,只有5月份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国转变为净流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

2010年8月美国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指出,该法案可能使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

2010年9月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为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今年初,奥巴马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其2012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

美国制造回归声势浩大,中国制造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挑战。

一直以来,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有利的人口因素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在各种有利条件下,投资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全球生产性资本不断流入中国。然而,随着人口有利优势的消失,中美两国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差距快速收窄。据预

测,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劳动力成本以往巨大的差距有可能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如果考虑航运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

当然,劳动力并不是改变中国竞争力的唯一因素,中国的要素价格普遍在上升。2010年以来,中国的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运营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的成本为每平方米11.15美元,在南京为14.49美元,在上海为17.29美元,在深圳为21美元。中国全国平均为每平方米10.2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米成本只有1.86美元至7.43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为1.30美元至4.65美元。虽然向西部转移可以降低用地成本,但企业物流成本会出现较大上升,并有可能失去沿海的产业集群优势。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大约10年前美国开始外包机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因为中国正快速涨薪,而美国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该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将有15%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本土,而最有可能回流的制造业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

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将近70%,占美国消费者年均消费约2万亿美元。

除了成本差距逐渐缩小,更多的也许来自于创新和技术的挑战。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继续保持领先,并在为新的产业革命做好技术储备。最近两年,尽管美国经济基本而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投入并未减少,2011年即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微软一家,去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去年研发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综合以上的分析,美国产业资本回流已经成为大趋势,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必须把重振中国制造当作中国经济长期战略的核心,绝对不能在逐步失去成本优势的同时,又由于创新滞后,而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警惕二三线城市房价脱缰式上涨

余丰慧

据媒体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外,不少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自今年5月以来成交量持续攀升,带动房价上涨。

无论是国家统计局部门还是民间机构发布的房价走势中,今年以来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环比都呈现较大涨幅。中国指数研究院8月1日发布的百城住宅价格指数显示,7月份7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上涨,并且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涨幅前十位的依次是:聊城、芜湖、台州、西宁、湘潭、无锡、淮安、重庆(主城区)、乌鲁木齐、洛阳,且上涨幅度均超过1%。从实际情况看,百姓对涨幅感受可能更大一些。笔者老家在豫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不通铁路和高速公路,可是日前亲戚来电说,小县城房价已经涨到了3000多元/平方米。豫西不算发达的地市级城市房价不但没有因为调控而下降,反而一直在走高。

二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房价持续走高的原因非常之多。许多城市成为被调控遗忘的角落是原因之一。许多三四线城市和几乎所有县级城市都不在限购政策范围以内。而随着高铁、高速公路开通,离大城市工作地路程并不长,一些城市工薪一族被挤出到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买房安家,助推了房价走高。

开发商战线转移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开发是原因之二。随着一二线城市限购政策的严格执行,开发商都把眼睛盯在了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进行开发,由于这些楼盘起价都远远高于当地房价的平均水平,它们

的到来直接拉高了房价。我老家房价由2000元/平方米不到,近期被抬高到了3000元/平方米,就是一家开发商建起了高层住宅而一下子拉高的。

原因之三是,建立商贸区、CBD、主题公园、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以及政府办公区等大拆大建正在地市级以及县城如火如荼地开展。大量土地、耕地被占用,土地价格直线上涨,带领房价不断攀升。

二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如此之高的房价,与当地百姓实际收入严重脱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二三四线城市从调控以来房价上涨势头就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涨势始终没有回头迹象,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强化二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政府的调控意识和责任。这些地方政府一个错误认识是,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住房矛盾不突出,不是调控重点,可以放任房价上涨,放任开发商抬高房价,放任囤地占地。笔者认为,上述错误认识一定要纠正,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也要问责该地政府。一定要加强市场管理,坚决遏制开发商到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大肆囤地开发、推高房价的行为。开发商必须公开开发成本,适度限制其利润空间。最后,要立即着手遏制地方政府大拆大建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脱离实际,不顾土地资源承受力,大肆囤地占地,建设大广场、各类开发区、商贸区、主题公园、占地过大的政府豪华办公楼和楼前广场等行为。

总之,三四线城市和县城不能成为被调控遗忘的角落,不能成为无所顾忌占地囤地的场所,不能成为开发商推高房价、攫取暴利的利益增长点,更不能影响到楼市调控的全局。

对欧贸易数据透露中国竞争力下降隐忧

苏庆义

8月10日,海关总署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7月份当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287.3亿美元,增长2.7%。其中,出口1769.4亿美元,增长1%;进口1517.9亿美元,增长4.7%。8月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美国6月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429.2亿美元,收窄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无论是中国出口的低增长,还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削减,欧盟市场都在里面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欧盟市场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中,1-7月份中欧双边贸易下降0.9%,主要原因是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3.6%。由于中国从日本的进口下降5.2%,中日双边贸易下降0.2%。由于进口与出口均下降,中国内地与台湾双边贸易下降3.5%。中国与美国、东盟、香港、韩国、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南非、加拿大等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呈增长态势。6月份美国对欧元区的出口额增长2.5%,对欧元区的进口放缓,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收窄。美国对华进口额继续增长,而出口额下降,面向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5.2%。

从中美两国的各自对欧贸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贸易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而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减少,主要原因则是美国对欧盟出口增长。由此可见,欧盟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债危机让欧洲经济深陷泥沼,欧洲经济增长乏力,2011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均出现负增长。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欧盟2012年全年也将

会是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欧盟的整体需求也会下降,中国出口面临着欧盟需求下降的挑战。但是,由于在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的同时,美国对欧盟出口反而呈现增长的态势,因此,中国对欧盟出口下滑不仅仅是欧盟需求下降的结果。

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是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中美是欧盟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欧盟从中国两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一半多。2011年,欧盟从美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30.3%,从中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23.4%。中美也因此成为争夺欧盟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在欧洲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中美产品竞争的结果显示中国产品处于下风。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足。

劳动力成本上升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出口产品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具有价格方面的优势,中国出口也因此出现巨额增长,但此后由于成本上升开始面临出口困难。在价格优势不再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和产品差异性又上不去,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必然出现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外贸转型是大势所趋。世界经济将面临较长时期的增长乏力,欧洲经济短期内也难以走出危机。未来几年,中国外贸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十二五”期间外贸总额年均增长10%的目标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此,中国在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外贸增长、减轻外贸企业压力的同时,应该着力调整贸易结构,培育中国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看看老外在干吗

汤子勤漫画

焦点评论

不妨学一学 法国工资总额预算经验

吴睿鹤

近日,媒体对117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61家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整理,发现2011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2965元,是去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4倍,是城镇私营单位在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2倍。

众所周知,央企垄断行业赚的钱不是“血汗钱”,比拼的不是人才、管理和技术,很多时候靠的是“穴熊猫”式的政策庇护。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指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1/3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难怪乎,最新一期“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结果显示,中资企业逐渐取代外企,垄断企业以福利高、稳定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宠。

种种迹象显示,央企“双高”(高工资高福利)已成为拉大行业收入差距的“罪魁祸首”。十二五规划着重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但类似“两高”这种“非典型腐败”、“软腐败”不但没有减少的迹象,相反却有加剧之势。

其实,西方一些国家在限制国有垄断企业“双高”方面的一些经验应成为我国学习的标本。例如法国,该国国有垄断企业一度实行高工资高福利,不仅让行业外的人士咬牙切齿,

也让法国政府管理者颇为头痛。后来,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这一奇招不但十分奏效,而且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所谓国企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和财政部之间建立一个工资谈判机制,企业没有完全的工资决定权。即使企业效益好,也不能随意大规模增加工资和福利。企业工资福利总额的确定分三个步骤。第一,财政部预测局在每年年末根据下一年物价涨幅和经济发展趋势及企业的预算情况,提出一个总体指导方针;第二,专家据此作出具体测算,列出工资福利总额增长的标准;第三,财政部按照此标准与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谈判,最终确定企业下一年工资福利的增长幅度。亏损企业暂时停止这种谈判,不允许增加工资福利总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中法两国情况大不相同,但是我国完全有必要结合自身特点,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国企工资福利的经验,推出中国版本的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模式,先搞试点,然后再全面推进,不仅要架构起以工资总额预算为中心的管理机制,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工资福利增长制度,更为重要的是,财政部门也要像法国那样,成立一个单独机构,承担起工资预测、测算以及谈判等日常管理。总而言之,只有通过有效的方法遏制了央企工资失控,才能有效遏制我国行业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的趋势。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 ppll18@126.com。

信贷量增长放缓令央行降准脚步加快

陈伟

7月份信贷仅增加5401亿元,同比多增485亿元,未能延续6月的趋势。这表明目前银行信贷扩张能力有所减弱,为支持当前疲软的经济下半年企稳回升,央行仍有必要下调存准率以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7月新增信贷远低于6月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是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每年7月份新增贷款都会比6月减少,原因在于:6月的季末时点过后,大量表内资金会重新转至表外,如7月存款总量比6月减少5036亿,由此使得银行的存贷比指标从6月末的0.675提高至7月的0.685,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也因此减弱,特别是受存贷比指标严重束缚的中小银行不得不放缓信贷扩张的步伐。

其次,央行货币政策放松的节奏有所放缓。如进入7月,尽管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一度紧张,但是央行并没有下调

存准率,而只是多次采用逆回购手段缓解资金紧张,这就使得银行间市场利率7月以来保持上升态势,7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78%,比上月高0.06个百分点,利率水平的提高无疑一方面提高了银行信贷供给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银行贷款利率的下调,抑制了企业贷款需求。

分部门来看,信贷增加减少的部分主要是企业,如企业短期贷款仅有954亿,同比减少359亿,这一方面由季节性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仍比较疲软,信贷需求较弱,如衡量企业经济活力的M1增速只有4.6%,未能延续今年4月以来持续反弹的趋势;再如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1042亿,回落到今年以来的最低值,同比也减少122亿,这一方面表明企业受限于贷款利率高等因素中长期贷款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在银行不良资产步入上行周期之际,银行对于风险较大的中长期贷款的放贷意愿不强。

尽管7月份新增贷款低于预期,但今年以来流动性逐渐好转的趋势仍在延续。从货币供应看,7月M2同比增速从6月的13.6%升至13.9%,创出央行货币政策放松以来的新高。此外,衡量社会整体流动性指标的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增加较多,7月达到1.0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5023亿元,这也使得该指标同比增速从6月的0.2%上升至7月的6.2%。从结构上看,债券融资增长显著,如7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487亿元,同比多2065亿元,今年累计则比去年同期增加3721亿,这表明在当前管理部门大力促进债券市场发展的背景下,债券融资作为成本更低、更便捷的融资方式获得更多企业的青睐,它有利于补充今年以来企业信贷增量的不足,促进企业投资需求与经济恢复。

但即使这样,我们认为,要继续推动流动性的好转,还是需要央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毕竟在当前资金紧平衡状况下,利率水平的走高最终也会抑制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不利于当前疲软的经济企

稳回升。因此,在8月财政存款仍将季节性增加,公开市场到期资金仅有440亿,外汇占款仍将维持低位等情况下,央行仍有必要通过下调存准率等方式引导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行,刺激银行信贷扩张。如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要运用逆回购、正回购、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灵活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继续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更有针对性、前瞻性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当然,我们也难以指望央行再如今年5月之后采取连续降息等方式刺激银行信贷扩张,毕竟8月物价回升在即,央行对于通胀风险已有一定警惕,央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这也会使得下半年信贷相对于去年同期仅是温和增长,难以对经济回升产生较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民族证券)